

一带一路战略下高职院校提升境外服务输出能力研究

李成明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1)

摘 要:文章首先用SWOT分析工具讨论了我国高职院校境外服务的优劣势和面临的机遇挑战;其次,从“输出国际化人才”“输出师资、科研等软实力”“输出品牌、项目”等方面阐释了我国高职院校境外服务输出能力内涵;最后,通过“三圈理论”分析框架,在“政府、学校、企业”层面,提出我国高职院校境外服务输出能力策略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高职;境外服务输出能力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17)0008-0083-06

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使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高职院校要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平台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提升中国高职教育的影响力。同时,为中国“走出去”企业培养急需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高职院校开展境外办学,输出教育品牌,培养境外本土化人才,切实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境外服务输出能力。

2002年12月31日,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规定高等学校境外办学应当优先举办具有中国高等教育比较优势或者特色的学科,并充分考虑所在国家(地区)的需求及发展特点,在境外举办以境外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或者采用其他形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实施高等学历教育、学位教育或者非学历高等教育。境外教育的根本是向他国输出教育服务,

要想输出,首先要具有输出的能力,也就是优势的学科与专业,将我国高校的强势专业推介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将我国的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输出到“一带一路”建设国家。

一、我国高职院校境外服务的SWOT分析

SWOT分析又称平衡分析,是组织进行战略选择的一种常用方法,用来确定组织自身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会和威胁等内外部因素。

1. 我国高职院校境外服务的优势

首先是一批高水平高职院校快速成长,形成教育品牌。财政部和教育部在2006年开始推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010年又推动实施“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国家分两批共重点建设了20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学校及其788个专业点。这200所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收稿日期:2017-02-28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轨道交通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6SJB880060);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资金资助(项目编号:RC2016101)。

作者简介:李成明(1975—),男,江苏南京人,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更好,2014年毕业生的雇主满意率91%以上,半年后毕业生的就业率93.7%,半年后的毕业生收入比上一届增加了21%。200所示范性高职学校的办学条件更好,中央财政的投入是45亿元,拉动地方财政投入90亿元,拉动行业投入28亿元。这200所学校的生均财政拨款,2015年达到了1.3元。除了这200所学校以外,各省在国家示范校的基础上,都建设了省级示范校,共281所。^[1]国家、省级示范校是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代表,在整个高职学校里占40%,形成教育品牌,具备学科和专业优势。

其次是初步具备高等教育输出能力。高职院校整体办学实力的增强,提升了国际影响力,也为高职院校逐步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条件。从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6)数据看,招收国(境)外留学生的高职院校数由上一年度的50所增加到69所,留学生由上一年度的2799名增至3847名,增长了37.4%。^[2]高职院校在“一带一路”建设活动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等品牌活动为我国职业教育输出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一批示范校与沿边地区利用学校品牌专业优势吸引境外留学生来华学习。当前我国已与世界30多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学位互认协议,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受到国际高等教育界的认同。^[3]

2. 我国高职院校境外服务的不足

首先是高职院校培养参与境外服务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数量不足、素质不高。“一带一路”建设企业代表深感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数量难以满足企业需求,缺少一大批既精通所在国语言、又熟悉所在国法律和文化习俗的一线技术技能人才和项目管理人才,更缺少像工长一类的一线生产指挥人才和对当地员工进行指导和培训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除了海外专业人才数量紧缺外,更缺乏高端战略人才、高端技术技能人才。^[4]“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遇到的人力资源问题,也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心所在。这必然要求高职院校和企业要建立起紧密的

合作关系,共同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境外输出专业由“资源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开展“订单式”培养,满足企业人才需求。境外办学紧紧围绕中资企业“走出去”和人才本土化战略展开。

其次是高职院校缺乏境外服务准备。“一带一路”连接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涉及近70个国家和地区,官方语言数量超过40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语言交流问题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企业需要面临的困境之一。“一带一路”战略面临小语种人才匮乏的瓶颈,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布点和建设严重匮乏。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语言支持、储备外语人才,加强非通用语种的外语教学,就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国际化课程体系及国际化师资队伍是高职院校境外服务输出的基石。除了缺乏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布点外,高职院校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匮乏也是束缚高职院校开展境外办学的瓶颈之一。当前我国尚缺乏完善的境外办学质量评估体系和监督机构,境外办学质量保障制度有待完善。

第三是缺乏境外办学战略与经验。从高职院校发展战略看,开展境外服务的愿望不够强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高职院校开展境外办学的投入大、风险高、回报难以预估,另一方面是高职院校招收境外留学生的工作日趋规范,不仅招生数量逐年增长,而且招收留学生的经济收益不断提高。有的高职院校更愿意把教育资源投入国内,赴境外办学的战略意识不强、内生动力不够。从高职院校境外服务的经验看,境外办学渠道和境外服务多样性不够。缺少对目标国别与区域的深入研究,缺少国际化合作平台,缺少与“一带一路”输入国的教育体制、市场需求、法律框架等的深刻理解。境外服务的灵活性不够,不仅仅是输出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到“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企业,而且探索设立境外分校、职业教育与国外学校联合办学、企业联合办学等多种形式的境外办学模式。

3. 高职院校境外服务面临的机遇

首先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为高职院校开展境外服务提供了行动指南。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主任王成海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工程,同时有大量富余优质产能向沿线国家输出,这给国内技能人员带来了参加境外项目工程建设的机会,也拉动了当地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4]“一带一路”建设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提供了重要机遇,围绕“一带一路”重大建设项目,高职院校需要适当调整相关专业设置,满足“一带一路”建设企业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紧抓机遇,高职院校开展境外办学不仅能够将优势教育品牌输出到输入国,而且能够吸引更多自费留学生来华留学,为学校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也会提高师生流动机会,开发新课程和促进现有课程国际化,推进高职院校办学理念转变,增强高职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是契合建立现代职教体系的内在需要。2014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支持我国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办学。积极探索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特别注重培养中国海外企业需求的本土化人才。一方面,在中央政府的国际化发展政策积极推动下,高职教育“走出去”和“请进来”成为高职院校的内在需求和发展趋势,也是未来建成世界一流高职院校的显著标志;另一方面,国际化人才的自由流动促进了技术技能劳动力的国际迁移,扩大高职教育的规模和生源渠道,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才培养服务。高职教育“走出去”和“请进来”有利于增强高职院校国际竞争力,也是国家建设开放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在需要。

4. 高职院校境外服务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政策多变化的挑战。“一带一路”涉及近70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人,约占全球63%,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和社会文化差异,沿线国家政体复杂多样,有“君主

立宪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总统制”“议会共和制”“君主制”和“主席团制”6种政体。在沿线国家中,叙利亚、阿富汗、乌克兰等国家长期处于冲突与战乱中,埃及、泰国和缅甸等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有些沿线国家禁止政党活动,分别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模式,而政权稳定度也各不相同。^[5]葛道凯认为职业教育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必须要清醒认识沿线合作伙伴国家经济社会呈现政体国体“多样化”和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带来政策“多变化”的特点。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基础也很不同,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处在什么阶段,然后再决定如何帮助他们获得最好的职业教育。^[5]

其次是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境外输出中的垄断地位。美国根据卡尔·D·帕金斯职业与技术教育法案,培养所有的学生要具有较高水平的知识与技能,谋得高技能、高标准急高薪酬的工作,68%的州都直接采用了全国职业群体体系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础,切实发展职业教育。澳大利亚国家资格认可标准培训包、职业教育产品的框架体系和标准制订、市场开发和销售等相对比较成熟。还有诸如德国“双元制”和英国的QCF体系“资格和学分框架”等优质职业教育资源。OECD报告显示,高等教育输出国所占份额为美国48%、澳大利亚9%、英国8%、法国7%。^[6]我国高职院校利用国际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方式方法也在逐年改变,由单一引进职业教育资源向与类型相近的国外高水平院校联合开发优质高职教育资源转变,由过去职业教育国际标准的旁观者向参与者改变。虽然近年来发展迅速,参与世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起步晚、规模小,与发达国家相比,师资队伍、课程体系等方面缺少国际竞争力,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等拥有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仍然处于垄断地位。

二、我国高职院校境外服务输出能力的内涵

《服务贸易总协定》界定了“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4种国际贸易提供方式,跨境教育主要包括人员跨境流动、项目跨境流

动、教育机构跨境流动。^[7]加拿大学者简·奈特认为跨境教育是人员、教育项目、政策、知识、观点、教育提供者以及服务等要素跨越国境的自由流动。^[8]简·奈特以流动性的概念构建了跨境教育的理论框架,包括纵向度流动和横向度流动两个方面,纵向度的流动性是从人员到项目乃至提供者等方面的流动,横向度流动是由教育合作到商业贸易的转变。^[9]在输出国和输入国“推拉”作用下,输出国的人才、教育项目、机构等流动到输入国,并在输入国开展相关技术服务、教育培训、举办项目或学习等一系列的服务活动,被称之为境外服务。境外服务输出是指输出国的高等院校为拓展教育国际贸易,将自身的教育品牌、人才、项目等流动到输入国的过程。境外服务输出能力是指输出国所具备的国际化人才、品牌、项目培训、境外办学等方面的能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享有竞争优势,满足输入国对教育资源、人力资源的需求。当前,我国高职教育面临“一带一路”战略、高铁“走出去”等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建设企业对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多,对人才、项目、办学等境外输出服务活动也急剧增长,因此,高职院校扎实推进境外办学,积极提供境外服务活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境外服务输出能力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从境外输出的内容看,我国高职院校境外服务输出可以分为“输出国际化人才”“输出师资、科研等软实力”“输出品牌、项目”3种类型。

一是输出国际化人才。一方面,围绕当地“一带一路”重大建设项目工程设置相关联的专业,我国高职院校与“一带一路”建设企业共同培养国际化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工作,满足中国“走出去”企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持续需求。另一方面,我国高职院校扩大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留学生,把他们培养成国际化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满足服务他们自己国家和“一带一路”建设企业的人才需求,提高当地学生就业创业水平。

二是输出师资、科研等软实力。一方面是高

职院校与“一带一路”企业,联合开展海外培训,服务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组团与中国中铁、中国中车等龙头企业在海外建立培训机构,输出师资、课程等为当地培养“本土化”应用技术技能人才,实现企业售后人才、技术技能人才的本土化融合。另一方面是高职院校将基于自身优势与特色,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科研服务、专业标准等方面提供咨询、人力和技术支撑。

三是输出品牌、项目。我国高职院校将已经形成的优质教育品牌和强势专业,借力“南南”合作、中非合作、中欧论坛等国际平台,联合“一带一路”建设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校或机构,联合在境外举办学校,实施境外办学。高职院校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办学,将优质教育品牌、资源、项目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

要想境外输出,高职院校要具有境外输出的能力。输出国际化人才,首先,高职院校要具备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也就是学校具有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国际化师资、课程、实训基地等软硬件条件,通过规定学制的学习,将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化人才的能力。从学生个体看,输出的国际化人才不仅仅是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技能,而且更要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境外服务能力。从高职院校的角度看,除了具有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外,还要具有国际化人才的输出能力,这种输出能力主要表现为搭建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一方面是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开放共享的平台,另一方面是畅通“请进来”“走出去”的渠道,高职院校依据“一带一路”重大建设项目调整专业设置,将所培养的国际化人才输出到目标国或者“一带一路”建设企业,满足境外服务人才需求。开展境外培训、境外科研、咨询的能力是培养输入国“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然路径,也是帮助企业实现售后人才、技术技能人才的本土化的能力。境外办学能力就是高职院校寻求市场需求契合度比较强的行业或领域,在境外举办分校或者合作办学机构,将优质教育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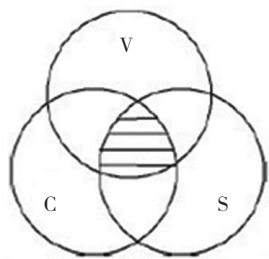
源输出到目标国的能力。境外办学能力是高职院校境外输出能力中比较最复杂的一种,是一种综合的办学能力的体现,既考验高职院校国际化交流与合作能力,又考验境外教育品牌的传播能力(表1)。

表1 境外服务输出能力

境外输出内容	境外服务输出能力
输出国际化人才	国际化人才培养、输出能力
输出师资、科研等软实力	开展境外培训的能力
	开展境外科研、咨询的能力
输出品牌、项目	搭建国际化交流与合作能力
	境外办学能力

三、我国高职院校境外服务输出能力提升策略

借助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者马克·莫尔(Mark.H.Moore)创立的“三圈理论”,即“价值、能力和支持”的分析框架,是一种战略管理的分析工具。“三圈理论”认为,首先,战略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其次,要具备一定的能力,以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第三,价值的实现需要得到作用对象或社会的支持。如图1所示,就形成了3个圆圈,V代表价值,C代表能力,S代表支持。只有三圈相交,战略才可得到有效执行,达到预期效果;反之,缺少任何一个圈,战略都将无法实施(图1)。^[10]



V-value(价值) C-capability(能力) S-support(支持)

图1 “三圈理论”示意图

“三圈理论”中的“价值、能力、支持”3个要素联系密切,强调三者的相互作用,若3个圈最大限度地接近和重合,就能达到最佳的预期效果。高职院校在提升境外服务输出能力策略上,争取和发展哪些要素,排除和抑制哪些要素,才能达到增强境外服务输出能力呢?

首先,要有价值指向性。高职院校在提升境外输出能力上的价值指向性上非常明确,指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和“一带一路”建设企业,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急需的国际化人才,开展境外服务活动。

其次,是争取支持。“一带一路”成为国家战略,职业教育承担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服务的使命,教育部实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支持我国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高校加强合作交流,兼容并包、互学互鉴,整合优质资源走出去,共同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高职院校在提升境外输出能力的社会支持上既有国家政府层面的,又有民间智慧、民间力量、民间方案、民间行动,具有支持的广泛性和深度。

第三,要提升能力。境外输出能力的基础是学校具有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开展境外科研、咨询、培训能力和境外办学能力。要提升境外输出能力,既要整合学校内部的资源,指向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又要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社会资源的支持。只有“价值、能力、支持”3个圈合力作用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一)政府层面

完善境外输出政策法规。我国《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已经执行15年了,已经滞后于时代发展需要,需要进一步修订相关条款,规范境外办学行为,同时要出台实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配套计划,加强境外办学的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的高职院校主动参与国际教育服务市场竞争,为高职院校营造境外服务输出的良好氛围。

建立境外输出协同机制。“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国家主导战略,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要制定职业教育国际化战略,建立境外输出协同机制,包括国际平台的谈判协商机制、品牌保护机制、内外联合机制等制度,规范和约束教育国际化行为。政府促使有条件高校实施走出办学战略,依托国家重大项目,建立统一的境外输出协同机制,有计划地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分校或教育基

地,输出优质教育资源,避免资源浪费,恶性竞争。

完善境外输出质量保障机制。在输出质量保障方面,英国、澳大利亚等教育输出大国都成立了跨境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制订统一的质量评估标准,而这种国家层面的质量保障又是促进国际认可的重要手段。逐步形成我国高校境外办学质量保障与监督机制,需要设立统一的跨境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加强跨境教育的监管,确保境外输出质量的国际声誉。同时,可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境外输出支持服务保障系统。联合高职院校和中国走出去企业共同开发契合市场需求的课程、专业标准、建立国际化职业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二)学校层面

科学制订境外输出战略。高职院校根据自身发展目标,积极慎重地开展境外办学,要重点研究和回答输入方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想能做什么、价值取向是否服务国家战略,境外输出的机遇和风险。一旦确立境外输出战略,学校要围绕“一带一路”重大建设项目工程设置相关联的专业,以外国留学生教育和中外合作办学为依托,整合校内资源,扎实推进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研究制订境外输出策略。

建立开放共享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平台。有合作基础、具备相同专业背景的国内外学校组建的联盟,是一种开放共享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平台,平台有助于加强教育政策沟通,平台有助于促进成员高校积极签署双边合作协议,平台有助于畅通国际合作渠道。平台内学校之间学分互认、课程互联,开放优势资源,共享教育成果,实现境内外高校间师资、资源、知识和信息的交换,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一带一路”的倡议将平台内各成员校紧密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就像一张网,而平台中各高校即为节点,实现互联互通,保障了境外输出的渠道畅通。

(三)企业层面

校企合作境外输出。高职院校要坚持与中国“走出去”企业合作境外输出,依据“一带一路”沿线国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与企业共同建立培

训机构;与此同时,可将自身优质教育资源输出到“一带一路”沿线国,举办境外分校或合作办学,打造中国高职教育品牌。坚持校企合作境外输出,高职院校可深度了解中国走出去企业的人才需求点,制订精准的境外输出战略、专业、课程、培训等,使境外输出工作更顺畅、更有效。“一带一路”建设企业对如高铁、能源、海事、装备等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势必促使高职院校对课程体系和专业设置进行调整与变革,增强境外输出人才的培养能力,最终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结构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 [1]葛道凯.数据视角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宏观形势[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6).
- [2]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麦可思研究院.2016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 [3]施蕴玉.高校境外办学:江苏的现状、形势和对策[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3,(12).
- [4]李术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召开一带一路战略与职业教育研讨会[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25).
- [5]徐华 黄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高职教育国际化路径研究[J].江苏高教,2016,(6).
- [6]Carpenter V.The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continental Europe:Theories and strategies,slides of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stitute of education[M].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2011.
- [7]赵俊峰.跨境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途径[J].外国教育研究,2009,(1).
- [8]Knight,J.Cross-border tertiary education:An introduction.In Cross-border Tertiary Education: Away towards capacity development[M].Paris: OECD,World Bank,and NUFFIC.2007:21-46.
- [9]刘晓亮,赵俊峰.美国跨境教育问题研究——基于简奈特的跨境教育理论框架视角[J].教育科学,2014,(8).
- [10]曹俊德.“三圈理论”的核心思想及决策方法论意义[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1).